

端午临江，鼓声如雷。当荆楚大地的龙舟再次破浪而行，我们不仅看到旌旗翻飞的竞技之姿，更触碰到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血脉。从屈原“乘船余上沅兮”的孤愤，到公安三袁笔下“沙市龙舟斗碧波”的盛况，再到今日百舸争流的壮阔，端午的波涛里始终激荡着楚人“不服周”的精魂。

本期三篇文章，既有龙舟竞渡的当代风采，亦有诗词歌赋的千年回响，更难得三袁兄弟亲历的民俗实录。三者交织，恰似一幅多维度的《荆楚端午上河图》：鼓点是历史回声，浪花是文化绽放，而每一位挥笔者，都在续写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当代注脚。

让我们循着文字兰桨，驶向记忆深处——那里有粽香、有诗韵，更有这座古城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。

凤鸣“青翰之舟”

□ 张卫平

“嘿——嘿！嘿——嘿！”激昂的号子声，洪钟般在九龙洲粼粼水面上激荡回响。桨手追随鼓点节奏，船桨齐刷刷入水，瞬间激起一片洁白浪花。

这精彩一幕，吸引众多路人驻足观看。让人不禁遥想起四百多年前，袁宏道笔下“北舟丝管南舟肉，情盘景促欢奈何”所描绘的热闹盛况，想必也是如此这般开场。

如今，在九龙洲训练的龙舟队，他们衣袂随风翻飞，依稀还带着当年“龙甲铺江丽，神装照水鲜”的飒爽风采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楚地龙舟的起源，实则与“鸟舟”息息相关，也就是楚人传统认知中的“青翰之舟”。

“臧尹固与王同舟。”据《史记·楚世家》所记，楚灵王“乘舟将欲入郢”。由此推测，楚国最早的舟船，极有可能是王室专属的游船。而屈原在《九章·哀郢》中所写的“过夏首而西浮兮，顺龙门而不见”的诗句，再结合考古发现，有力地说明了楚都纪南城东南的水门，便是传说中的龙门。屈原诗中“驾龙兮北征”与“驾两龙兮参螭”的描述，更是进一步印证了楚王室拥有龙舟的事实。

虽然《荆楚岁时记》注里明确记载：“五月五日竞渡，俗为屈原投汨罗日，伤其死所，故并命舟楫以拯之。”但实际上，早在纪念屈原之前，龙舟已然存在于世。翻开更为古老的典籍《穆天子传》，便有“天子乘鸟舟、龙舟，浮于大沼”的记载。只不过，楚地最初竞渡所用的并非龙形之舟，而是鸟舟，即凤舟的雏形。尽管龙舟竞渡与屈原的关联早已深入人心，但据楚学专家宋公文先生考证，楚国王室既有象征威严的龙舟，也有充满浪漫色彩的凤舟。

楚人对凤鸟推崇备至，以凤为至尊图腾。那些悠悠划过历史长河的“青翰之舟”，不仅承载着一个古老民族对凤鸟

深深的崇敬之情，更蕴含着他们对广袤水泽的敬畏之心。

荆州大地考古出土的虎座凤鸟悬鼓、虎座飞鸟与虎座立凤等大量凤鸟形象与纹样的文物，清晰地昭示着凤凰图腾在楚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写下“驾玉虬以乘鸞兮”，将龙与凤并列为登天的工具，是楚文化中对龙与凤双重崇拜的诗意表达。《说苑·善说》所记载的“青翰之舟”，正是悬挂着长尾青羽的凤舟。不妨想象一番，楚君悠然泛舟于碧波之上，凤形的舟首轻盈地劈开水面，旌旗猎猎作响，恰似凤凰展翅，那该是何等飘逸、何等壮观的景象啊！

当北方严格恪守礼制，规定唯有天子方可乘坐龙舟之时，楚地的封君们已然能够驾着凤舟，自由自在地遨游于云梦泽。这种不拘一格、洒脱奔放的浪漫情怀，造就了荆楚文明独树一帜的气质。或许正是因为楚人崇凤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，在荆州草市和洪湖新堤，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独具特色的凤舟竞渡活动，它们宛如凤凰文化的活态化石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传承的力量。

端午时节，楚地那长达三十米的凤舟，精心饰以金冠黄羽，中舱还特意插上嫩绿的柳枝。当它在水中划动时，远远望去，恰似一只灵动的凤凰贴着水面轻盈飞翔。这种“龙凤共舞”的奇妙景观，正是楚文化中龙与凤双重图腾在当代的精彩演绎。学者研究发现，凤舟造型与古籍中记载的鸟舟高度吻合，这似乎在暗示，在龙舟成为主流之前，楚地的竞渡活动很可能是以凤舟为主。荆州人在不经意间守护的，实际上是端午更为古老、更为珍贵的文化记忆。

龙，能驾驭水的力量；凤，可沟通天地的神秘。楚人的精神世界，就在这水天之间自由地翱翔驰骋。屈原在《离骚》

中“驾玉虬以乘鸞兮，溘埃风余上征”的诗句，再次将龙与凤并置为登天的工具，这无疑也是楚地这种二元崇拜在文学领域的生动呈现。当北方诸侯严守刻板的礼制，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乘坐龙舟时，楚地的封君们却已能乘凤舟悠然游弋于江湖之上。这种不拘一格的文化性格，无疑造就了荆楚文明独一无二的魅力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与屈原齐名的伍子胥，却并未在荆州端午习俗中占据一席之地。这位为报家仇而引吴师攻破楚国的复杂人物，在苏州被尊奉为城隍，其传说也成为吴地端午的核心内容。同一节日，在不同的地域纪念不同的对象，恰恰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。荆州之所以选择聚焦屈原，或许正是因为他那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爱国情怀，与楚人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。当龙舟竞渡被赋予拯救屈原的深刻意义，端午习俗便从单纯的驱疫禳灾的祭祀节日，成功转变为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纪念节日，这无疑也是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。

暮色悄然降临九龙洲，参与今年龙舟赛事的一艘艘龙舟，静静地随波荡漾，在晚霞映照之下，泛着一层如梦如幻的金色光芒，恍惚间，仿佛楚君的“青翰之舟”掠过水面，留下阵阵轻柔的涟漪。那绘有凤羽的舟楫，不仅仅是怀古思幽的载体，更是文化自信的鲜明象征——当大多数地方只见龙舟竞渡时，荆州人依然清晰地记得，他们的祖先曾驾着象征着吉祥与自由的凤凰，在水天之间书写下瑰丽无比的诗篇。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所有的文化符号都在不断地演变、流转，唯有对先贤的追慕，对生命的礼赞，如同永恒的星辰，熠熠生辉，亘古不变。从明代的万人空巷，到今日九龙洲那穿越时空的桨声，始终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永恒的主题：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

龙舟桨影：三袁诗中的晚明沙市商埠

□ 余波

楚地龙舟自古带着几分悲怆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龙舟竞渡本是祭祀仪式，楚地从战国时期就有“舟楫拯救屈原”的祭祀传统。但到了明末的沙市，龙舟竞渡早已褪去悲情，变成一场全民狂欢的“龙舟市集”。

当时沙市的端午龙舟竞渡应该是在长江内河（使河）之上。明万历年间（约1600年前后），袁宏道在沙市兴安巷南端长江边修建雪楼，此楼本就是为临江观景而建，楼下的龙舟竞渡景象自然可尽收眼底。袁宏道笔下“倾城出岸边”人潮和“万人齐着眼”的热闹场面，都在描述这个传统节日的变化。沿江的朱漆楼阁里，富商们推开雕花窗棂；青石板码头上，市井百姓摩肩接踵；江面上，“黄头胡面”的船工们挥汗如雨。这场跨越阶层的集体狂欢，全面展示了晚明社会阶层流动的状况。

作为“西控巴蜀，东连吴越”的商贸重镇，沙市的龙舟竞渡自然充满商业气息。精明的沙市商人们，知道怎样蹭流量，硬是把一天的端午节延长成持续数日的“市集”：前五日设龙舟市集，竞渡日全民狂欢。在王百川《沙市志略》中，也记载了沙市“五月龙舟赛，沿江设市，百货云集，观者如织”的盛况，这也反映了明末“龙舟市集”的商业特征。袁宏道“笙歌沸天尘捲地”的描述中，藏着的就是精明的生意经。沿江商铺

应该还有推出专门的“竞渡宴”，茶楼上设置的VIP观赛包厢，市上“廿一万肩相磨”的拥挤人群，都在演绎着“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”的古老智慧。这让人想起如今旅游景区精心设计的“沉浸式体验”，古今商道，原来一脉相承。

明代沙市既是蜀船东下的终点，又是漕运物资转运的起点——川黔的山货、湘鄂的粮食在此集散，使沙市成为南北文化交融的枢纽。市场的形成，必然催生码头经济的商业模式。明末，“沙市十三帮”已有雏形。袁宏道诗中“北舟丝管南舟肉”的并置，揭示了南北商帮在竞渡中的角色：北方商帮用丝竹乐舞营造节庆氛围，南方商帮则以肉食宴饮吸引客流，形成“丝管”与“肉食”的双重经济支柱。

同时，这些商帮深度参与其中。据《沙市志略》记载，万历年间沙市竞渡资金多由盐商、布商赞助，龙舟装饰所需的锦缎、漆器等物料，均通过长江航运从汉口、苏州等地输入，形成“千艘万舶聚沙头”的航运格局。这种商帮赞助模式，实质是商业资本对民俗活动的渗透，竞渡已成为商帮展示实力、拓展市场的舞台。

盛大的商业活动中，盐商、布商、典当行老板等新兴商人阶层也通过赞助竞渡获取社会地位。袁宏道“琵琶卖去了官税”的调侃，直接指出商业税收已取代农业税成为财政支柱，商人凭借经济实力逐渐突破“士农工商”的传统等级秩序。在商业重镇沙市，商人的社会地位肯定比农民高很多。

龙舟竞渡还催生了专业化的制作与竞赛群体，就像现在的体育赛事执行公司。袁中道“龙甲铺江丽”的描写，展现了龙舟装饰的奢华程度：一艘龙舟需数十工匠耗时一个多月，用丝绸、金箔、漆器精心装饰，形成“龙舟锦甲价千金，商贾争夸颜色新”的斗富之风。这与如今奢侈品赞助体育赛事的商业逻辑多么相似。

同时，竞渡还有了职业化团队。诗

中“健儿半负播州戈”暗示部分船工兼具军事与竞技双重身份，这表明卫所制度崩坏后，有不少当兵的出来赚外快，这也许是当时底层劳动者不得不身兼数职的生存方式。此外，“竞渡宴”“龙舟模型”“艾草香囊”等衍生品的销售，构建了从原材料采购、龙舟制作到周边文创产品消费的完整产业链，标志着传统民俗向商品经济的深度转化。诗中“黄头胡面”的船工形象与“朱帘窈窕”的贵族楼阁形成空间对峙，这种视觉反差揭示了市民阶层的崛起——他们不再是传统叙事中的“旁观者”，而是通过竞渡活动确立了文化话语权。袁中道“万人齐着眼”的集体凝视，本质上是市民阶层对公共空间的主导，与晚明通俗文学中市民形象的活跃形成历史呼应。

而这正是公安性灵文化的精髓。可以说，公安三袁的龙舟诗作，与《荆楚岁时记》《沙市志》等文献共同构成荆州端午文化的多维记忆。袁中道“龙甲铺江丽”的描写，与洪湖出土的明代龙舟模型（船头凤首、船尾凤尾）相互印证；袁宏道“妖鬟袖底出中冠”的细节，在江陵方言民谣《划龙船》中得到声韵延续。这种文学与民俗的互动，突破了传统史书对“宏大叙事”的偏爱，用“不避俚俗”的白描手法，记录下船工、商妇、歌女等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，为晚明史研究提供了“自下而上”的观察视角。

四百年后的今天，站在护城河边观看龙舟竞渡，鼓点声中似乎还能听见历史回响。或许，这正是三袁诗歌超越时空的魅力所在。那些“红霞如锦汗成河”的激情，“龙甲铺江丽”的华美，都在诉说着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当商业文明与传统文化相遇，总能碰撞出绚丽的火花。从明末沙市商帮的营销智慧，到今天“龙舟经济”的产业开发，长江之滨的人们始终懂得如何将文化传统在商业土壤中焕发新生。

荆州，这座浸润着楚风遗韵的古城，与端午节结下了悠久奇缘。作为屈原生命中四分之一时光的栖居地，荆州纪南故城不仅是楚文化的核心载体，更因屈原投江的悲壮故事，使端午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专门符号。历代文人以诗为笔，在关于荆州端午的书写中，构筑了三重独特意境，使其在中华端午文化图谱中独树一帜。

诗词中的屈原精神长歌

在荆州，端午粽叶里包裹着从未改变的认知基因，每一缕艾香都在诉说对屈原的追思。唐代诗人文秀的七绝《端午》，虽未标明特指荆州，但却直抵楚文化根脉：“节分端午自谁言，万古传闻为屈原。堪笑楚江空渺渺，不能洗得直臣冤。”这首诗以设问起笔，将荆州人的集体记忆锚定于屈原——端午祭屈，早已超越习俗范畴，成为刻入楚文化发祥地的精神仪式。

更多诗人以笔为祭，在字里行间续写对屈原的缅怀。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在《五月五日》中，以“屈氏已沉死，楚人哀不容”的深沉笔触，既痛惜屈原“忠而被谤”的悲剧命运，更以一个“哀”字道尽楚人对高洁品格的永久追慕。南宋江湖诗派代表诗人戴复古，在《端午丰宅之提举送酒》中化用《离骚》典故：“今日独醒无用处，为公痛饮读离骚”，将对屈原精神的敬仰融入酒盏，在微醺中完成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。

尤为动人的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《端午》诗：“人命草头露，荣华风过尔。唯有烈士心，不随水俱逝……”诗人以草露、风华为喻，反衬屈原精神的不朽，更以“至今荆楚人，江上年年祭”的白描，勾勒出荆州人以习俗为舟、渡送忠魂的文化自觉。这些诗句交织成荆州端午的情感光谱，让屈原的“美政”理想与“九死未悔”的人格，成为穿透历史烟云的精神火炬。

诗词中的楚风民俗图鉴

荆州端午的仪式感，是楚文化活态传承的绝佳注脚。古城东门外九龙洲的龙舟竞渡，至今仍激荡着楚人血性——桨声划破碧水，号子穿透云霄，龙舟如蛟龙出水，既是对屈原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精神呼应，更是荆楚儿女“敢为人先”的文化宣言。南宋诗人陆游在《重五同尹少稷观江中竞渡》中，以“楚人遗俗阅千年，箫鼓喧呼斗画船”的热闹场景，与“风浪如山蛟鬣横”的自然险境形成张力，凸显楚人在险滩激流中勇毅争先的性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诗虽另见于江西玉山地方文献，但结合陆游生平事迹，学界多认为其创作时间与地点是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五月，陆游时年46岁，赴夔州通判任，途经江陵等楚地核心区，描写的是荆州端午盛景。

古诗词亦记录下荆州端午的多元民俗图景：北宋史学家刘敞在《端午》中铺陈“万里荆州俗，今晨采药翁”及其“浴兰”“服艾”“泛菖蒲酒”等，以“角饭畏蛟龙”的问句，将民俗细节与屈原传说巧妙勾连；诗圣杜甫在《惜别行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》中，以“尚书勋业超千古，雄镇荆州继吾祖”诗句，将荆州重镇的历史地位与端午御衣的皇家礼制相联结，赋予地域习俗以王朝叙事的宏大视角。这些文字如同民俗纪录片的镜头，让佩香囊、悬艾蒲、食角黍等久远习俗，在诗词中定格为鲜活的文化现场。

诗词中的荆州端午即景

荆州的端午风光，曾触发历代无数诗人的创作灵感。唐代诗人元稹被贬江陵期间，在《表夏十首·其十》中写道：“灵均死波后，是节常浴兰。彩缕碧筠粽，香粳白玉团”——前句追溯浴兰祈福的古俗，后句以“彩缕碧筠”“香粳白玉”的精微对仗，勾勒出荆州粽子的视觉与味觉之双重记忆。诗人在“逝者良自苦，今人反为欢”的对照中，既感伤屈原的命运，又以节俗的烟火气，完成对生命价值的叩问。

北宋苏轼的《屈原塔》、南宋范成大的《竹枝歌·端午》等传世之作，虽存在地域归属争议，但均被荆州文化记忆所吸纳。这些诗词如同一幅幅水墨画卷，在“渚宫台榭楚江滨”的地理坐标中，晕染出“榴花照眼艾垂门”的节序风光，让古代地理范畴中的荆州的风光、柳影、粽香，都成为端午文化的诗意注脚。

从情感溯源到民俗展演，从历史纵深到现实图景，古诗词为荆州端午构建了立体的文化坐标系。在这里，端午不仅是一个节日，更是楚人精神的文化原乡——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叶扁舟，载着千年的追思与敬仰，在时光的江流中，永远向着理想的“芷兰之境”溯游而去。这种独特的意境，正是荆州呈献给中华文明的端午诗篇。

古诗词中荆州端午的独特意境

□ 余大中

二〇二五年第二十期
总第一百五十四期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139

文化荆州

